

杨家将研究质疑(二)

顾全芳

〔提要〕 本文共分四部分,上期发表的是前半部分:一、杨业不是山西人;二、杨业前半生功小过大。本期发完后两个部分。

三、杨业的功绩在于八年抗辽

杨业降宋以后,宋太宗认为杨业“老于边事”、“洞晓敌情”,遂安排他做代州刺史,在山西雁门关一带,抵御辽国。从此,杨业真正走上了抗辽的道路;他一生的光辉业绩,就在于八年抗辽。

宋太宗平定北汉之后,乘胜率师直攻辽境,包围了南京(今北京)。但由于草率从事,后援不济,加上契丹贵族耶律沙等全力援救,宋军以失败而告终。这些大战,杨业参战与否,因缺少文字记载,我们不得而知。

公元九八〇年春,契丹贵族以十万之众,进犯雁门关,潘美“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,自西径至雁门北口,南向与美合击之,敌众大败,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多啰,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,获铠甲草马甚众。”^①宋军大胜,一转过去战败之局势。这次战役,潘美、杨业都立了大功。特别是杨业,发挥了“勇而有谋”的长处,抄小路于敌后给辽军以沉重打击。代县鹿蹄涧有杨将军祠,就是后人为纪念杨业在这一带战胜辽军十万之众而建筑的。从此,“辽人畏之,每望见业旗,即引去。”^②宋太宗加封杨业为云州观察使。

在一些史籍文论中,为了抬高杨业,竟不提潘美之功。例如《宋史纪事本末》,就仅写杨业的战功,这是不公平的。潘美是这次战役的总指挥,如果把功劳全归杨业,那么,仅凭杨业所领的“数百骑”,即使如《宋史》所称的“数千骑”,就能使辽的十万之众大败,并斩将俘马,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
这年冬,辽贵族耶律休哥与宋军战于瓦桥关,宋军大败,被耶律休哥追到莫州。十一月,宋太宗亲自出马,抵御契丹,进驻大名,逼使契丹军退去。南宋遗民徐大焯在其《烬余录》中,记载了杨家将的事迹,其中有一段话,很值得研究。书中说:太平“兴国五年,太宗莫州之败,赖杨业护驾得脱险难。”“先是,帝出长垣关,败契丹于关

南,旋移军大名,进战莫州,遂为契丹所困,杨业及诸子奋死救驾,始得脱归大名。”^②这是唯一的杨业父子救宋太宗的文字记录,其它史书都不记载。这一记载,时间、地点上略有出入,但决不可能毫无根据,凭空捏造。为什么别的史笈不记此事?一是由于杨业是降将,二是由于太丢宋太宗的人。《烬余录》作于《宋史》等史书之前,其它有关杨家将的事迹,与《宋史》等基本相同。《宋史》等上说,杨业投降宋太宗之后,宋太宗曾秘密送了杨业许多东西。《烬余录》则说是在杨业救驾之后,宋太宗秘密送的。看来,《烬余录》的这一段记载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皇帝是不会让臣将们“无功受禄”的。即使这一记载出于传闻,由于徐大焯离北宋初才一百多年,这一传闻也有一定的可靠性。后来有关杨家将的戏曲、小说,都写了杨业父子救驾之事,其来源即出于此。

公元九八六年,宋太宗乘契丹景宗死,决定大举北伐。当时兵分三路:曹彬、田重进等两路兵攻河北;潘美、杨业从雁门关北进。曹彬等出师顺利,占涿州、灵丘等地,但曹彬等却由于胜利冲昏头脑,违背宋太宗关于曹彬屯军以张声势,待潘美、杨业取得雁北地区之后再进取的战略方针,结果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,大败于岐沟关,沿路被追击,曹彬等仅“以数骑亡去,余众悉溃。”^④曹彬的失败,严重影响了战局。本来,潘美、杨业连克云、应、寰、朔四州,横扫雁北,契丹守将纷纷降宋,形势十分有利。由于曹彬败北,潘、杨不得不作战略退却。

在潘美的撤退过程中,宋太宗命令将四州之民内迁,并用军队保护。耶律斜轸领兵十万与贺令图军战于五台,贺败;潘美与耶律斜轸战于飞狐,又败。“于是浑源、应州将皆弃城走”。^⑤耶律斜轸占寰州,杨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;后有重兵压境,前有四州之民。杨业主张避开耶律斜轸的军队,保护人民转移。监军王先反对,主张出雁门关,与契丹战。杨业力陈已见,说明与契丹交战,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,况且敌强我弱,战而必败。然而,王先讽刺,威胁杨业:“君侯素号无敌,今见敌逗扰不战,得非有他意乎?”^⑥杨业被逼,只得“今君责业以不死,当为诸公先。”^⑦临行前,泣求潘美,在陈家谷口部署兵马,“俟业转战至此,即以步兵夹击救之,不然,无遗类矣。”^⑧潘美王先陈兵陈家谷口不久,王先以为杨业打了胜仗,“欲争其功,即领兵离谷口,美不能制,乃缘灰河西二十里。俄闻业败,即麾业却走。”^⑨作为总指挥的潘美,听杨业之败而不救,竟然临阵逃脱了。

杨业与辽军转战近日,到了陈家谷口,除了荒草顽石,人影全无,悲痛无限,只得领兵死战。最后“身被数十创,士卒殆尽。”^⑩杨业单人独马,又杀伤敌近百人之后,不幸中箭堕马,为敌所俘。

杨业被俘之后,英勇不屈,绝食疮发,三日而死。耶律斜轸“遂函其首以献。”^⑪与契丹贵族的野蛮掠夺,奋战了多年的杨业,壮志未酬,血染沙场!

杨业牺牲了。他是为保卫国土而殉国的民族英雄。在这样的民族英雄面前,人们怎能不哭泣致敬!

有人认为杨业是“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军事将领,他难以成为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,”并由杨业曾降宋,推论出来他可能想“再投奔契丹”^⑫。这种论断,是片面的。因为如果用前者来衡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,那么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:像岳飞、史可

法、郑成功等，都是有可能成为投降派的。如果用后者来推论杨业的最后表现，那就是说，你投降过北宋，也会投降契丹。前后两者，都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主观猜测。

且不论杨业降宋无罪而有功，单从民族意识上讲，降宋与降契丹贵族，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投降契丹，意味着向民族败类认输。在杨业的心目中，这一点是明确的。在汉族人民与契丹贵族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，即使作为“地主阶级中的一员军事将领”，也会走上坚决抗战的道路，更何况杨业的忠君思想支持下的行动，是得到宋太宗的赞许的。杨业为国殉难的进步性，正在于这一行动在客观上符合人民与民族的愿望、利益和要求。

实际上，史实表明杨业深恨契丹贵族而忠于宋庭。在陈家谷兵败之前，他视死如归，战败之时，杨业劝其部下：“汝等各有父母妻子，与我俱死，无益也，可走还报天子。”^{③③}杨业身负重伤，还在奋战杀敌。试问：杨业有降辽之念，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投降呢？既然杨业被俘后“但称死罪”而想降辽，他为什么又要绝食三日，而契丹方面又任其“疮发”而不治呢？这恰恰证明了杨业是拒绝投降而自愿求死的。

因此，耶律斜轸所奏报的杨业被俘之后，曾“但称死罪”，也是被夸张而横加给杨业的。这条史料，是不足为凭的。还是《契丹国志》等史书上的记载，即杨业被俘后说“主上遇我甚厚，何面目求活于虏中”^{③④}，绝食三日而死，是可信且可靠的。

四、潘美、折太君与杨六郎

杨业壮烈殉国了。直接俘杀杨业的，当然是契丹贵族耶律斜轸之辈，这是无庸争议的。现在的问题在于：究竟是谁将杨业逼上死路的？

杨业自公元九八〇年威震雁门，“契丹畏之，每望见业旗，即引去。”树大招风，引来了“主将戍边者多嫉之，有潜上谤书，斥言其短。”^{③⑤}这里向皇帝打小报告的“主将”是谁呢？有的史学家认为，这肯定是专指潘美。其实，这里并不专指一人，而是指一些人，其中包括潘美。因为潘美不只是“主将”之一，而且还是常与杨业共事的“主将”。正由于此，《烬余录》记载的是“诸将大忌之”，^{③⑥}而《雪乘搜略》则是“中外主将多忌之”，^{③⑦}用了多数词。

为什么大家会嫉妒杨业呢？重要的原因在于杨业是降将。降将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叫潘美等开国功臣，怎么能服气呢？

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王先、刘文裕要杨业去冒险送死了。这是在借刀杀人。潘美身为兵马部署，是有权裁定谁是谁非的。由于潘美也嫉妒杨业，加上王先、刘文裕根子较硬，不好惹，所以潘美“听先而不听业”了。

现在看来杨业的死，潘美是有直接责任的。潘美见杨业被困而不救，无疑别有用心，这一点，宋太宗心里很明白，也十分生气。杨业死后，宋太宗将王先、刘文裕革职除名，将潘美削职处理。一年之后，宋太宗又为潘美“复故官”，并且“加冈平章事”。^{③⑧}宋太宗做得对吗？对的。人非完人，岂能无过。如果因为一个人战死了，而一定要处死另一个人，也就未免过分了。

从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潘美，这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，还是历史上有作为的进步人物。他帮助宋太祖、宋太宗灭南汉，平南唐，铲北汉，多次率军与辽贵族抗争，功大过小。如果我们也如小说、戏曲那样，把潘美说成是狡诈专横的反面人物，那就背离了历史。历史上的潘美，完全不囿于舞台上的潘美，正如曹操一样。我们不必为舞台上的潘美翻案，因为艺术必须服从于典型化的要求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为艺术上的潘美所左右，或者用艺术形象来代替潘美其人。

杨业殉国了，群情激忿，是谁不畏险难去“告御状”的？是杨业的妻子折太君。

“折太君，德晟之女，杨业之妻也。”^{③⑨}她的父亲折德晟，是陕西府州（今府谷）的地方军阀，“自晋汉以来，独居府州。”^{④⑩}她的祖父折从远，是后汉的永安武胜军节度使。到后周，折德晟便成为永安军节度使。折从远祖孙三代，从五代十国到北宋的纷乱年代，除了参与各国之间的争战之外，对于契丹贵族的进扰，也曾一再进行抗击。

例如，还在后晋时，“契丹欲迁河西之民以实辽东，世人大恐，从远因保险拒之。”之后，“从远引兵深入，拔十余寨。”^{④⑪}公元九四五年，折从远又进击契丹，围胜州，攻朔州。

折德晟的儿子，即折太君的兄弟折御卿，也是抗辽名将公元九八二年，折御卿击破辽兵于新泽砦。九九五年，辽将韩德威与折御卿战，被折大败于子河汉，这年十二月，韩德威又“率众入寇，以报子河汉之役，御卿与疾而行。”^{④⑫}由于病重，其母亲叫他回家就医，折不回，病死于前线，年仅三十八岁。

正由于折太君的祖辈及兄弟，都曾积极抗辽，因而折太君很有可能“佐（杨）业立战功”。杨业死后，折太君“上书陈夫战没。王先违制争功。”^{④⑬}

折太君是哪里人？一些史书上说折从远“世居云中”，是雁北人。但折从远是府州的地方土豪，折家久在府州居住，因而折太君是陕西府谷人。一五七五年十月，有人在府谷县找到了折御卿的墓志，^{④⑭}这就用事实证明了折太君是府谷人。

有人根据《关中金石记》、《保德州志》有关折太君的资料，考定折太君是山西保德人，是缺乏充足理由的。《保德州志》的不可靠性，已如前述，它所记录的“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”，^{④⑮}不过是抄录之词，并未见诸墓地。

清代的康基田，著有《晋乘搜略》，第二十卷上沿用上述材料，并说“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射。婢仆技勇，过于所部。”把传说故事作为“世传”，以证明折太君是保德人。晚清李慈铭的《越缦堂日记》，更为画蛇添足，竟说“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，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，即业妻也。西北人读折音如蛇，故碑官家作余太君，以折窝村为社家村，又傅会为蛇太君，委、蜕不分。”这就毫无道理了。读音可以相近，但为人作碑，作传，为什么一定要把“折”姓改成“余”姓呢？用“折”姓不是更能表明余太君是折德晟的女儿吗？既然“至今”折太君的碑犹在，为什么大家都要写成“余”太君呢？又为什么碑文不见只字呢？可见这个碑是莫须有的。

实际上，有关余太君的故事与传说，不过是历代人民的想象与愿望的产物，属于艺术典型。用余太君这个艺术典型，来求证折太君其人，等于先有假设，再去求证。这是徒劳无益的。杭州有雷锋塔，是白蛇娘娘的葬身之地，你能求证出白蛇的历史真实吗？

可惜的是，当代一些杨家将历史的研究者，还在沿用这一研究方法，并进而得出同样荒谬的结论。

顺便举一个例子。《保德州志》上有“慕容氏，杨业孙文广妻，州南慕塔村人，‘雄勇善战’^{④6}”的记载，有人便以此为据，望文生义，进而考定“慕容氏”即穆桂英。理由呢？唯一的理由是“慕容”二字音近“穆”。这能算严肃的历史研究吗？“慕容”是双姓，“穆”是单姓，音再近，能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姓改成这样？实际上，穆桂英也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，你是无法考证出她是谁的妻子的。因为在历史材料中，根本没有有关穆桂英的任何史料，历史上究竟有无此人，尚不能肯定。假如你要肯定小说、戏曲中的穆桂英，即是历史上的杨文广的妻子，那么，你为何不去考证一下穆桂英如何破天门阵，如何使用我们现在都不可想象的所谓“法术”呢？这难道也是实有其事吗？谁能考证出孙悟空是哪里人？他老婆又是谁？

杨业死后，宋太宗录用了杨业的儿子。但是，杨业究竟有几个儿子，以及这些儿子是怎么排行的，各史记载很不一致。由于有几个儿子史书上只有姓名，而无史实，所以讨论起来意义不大。应该讨论研究的是杨延昭，因为他在《宋史》等史里有附传，也是抗辽名将。杨延昭的抗辽史迹，各史记载略同，所以研究杨家将的史家们，也无多大争论。争论的焦点在于杨延昭究竟是杨业的第几个儿子。

有人认为，杨延昭是杨延朗的改名，是长子。杨延朗改名杨延昭，在《宋史》、《隆平集》、《小浮梅闲话》等书里，都很肯定。但在《后山谈丛》、《续资治通鉴》、《十国春秋》等书里，却不说延昭是延朗的改名，而是一直用延朗的名字。因此，到底延朗与延昭是否是一人，也就有了争议。由于延朗在史书中排名在前，所以一般认为延朗是杨业长子。既然延朗后来改名延昭，那么，杨延昭应该是杨业长子。但是，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。因此，也有人认为杨延朗或改名后的杨延昭，是第六子。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。因为第一，杨业陈家谷兵败，他的儿子延玉冈时战死。在杨业死后宋廷封升杨业儿子的官位时，明确说明“次子殿直延浦、延训，并为供奉官，”^{④7}而没有说明长子是谁。所以，延玉很可能就是长子。第二，《宋史》上说录用杨家子时，首先提到“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，”但没有说延朗是长子，他的封位较高，是因为战功较大，并不是由于他是长子。第三，《烬余录》等书中，明确指出：“长子渊平随殉”即同杨业一起战死，同时指出“四子延环初名延朗，”“六子延昭，从征朔州功，加保州刺史。”第四，更为有据的是，《宋史》等记载杨延昭死于大中祥符七年，终年五十七岁。照此推算，杨延昭应该是生于公元九五七年。杨业的生卒年月，史无记载，但据杨业“弱冠事刘崇”，杨业应生于九二二年左右。这就是说，杨业于三十五岁左右，生杨延昭。杨业仅儿子就有七个，不会在这个年令生第一个儿子。有人根据杨业的后代（这已是很不可靠了）所述，杨业生于九二八年。即使如此，杨业也在二十九岁时生延昭，同样不大可能是长子。因此，杨延昭即杨六郎，是杨业的第六个儿子，较为可靠。

杨业祖孙三代，为了民族的利益，前赴后继，英勇献身，不愧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。我们研究与讨论杨家将，目的还是在于肯定并发扬这种爱国家、爱民族的精神。至于评话、小说、戏曲与传说故事中的杨家将，属于文艺研究，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，

笔者将另用专文论述。总之，历史上的杨家将，已完全不同于文艺作品中的杨家将。研究杨家将历史的偏见与疑点，大多由于将历史上的杨家将，混淆于文艺上的杨家将所造成。本文力图在这两方面加以澄清，但水平有限，不当之处，请予指正。

注：

- ①《东都事略》第34卷《杨业传》
- ②⑨⑩——②⑥②⑦②⑧②⑨③③③③③⑦《宋史》第272卷《杨业传》
- ③④⑦③《晋乘搜略》第20卷
- ④见《十国春秋》第106卷，及《嘉靖》太原县志、《光绪山西通志》等
- ⑤尹⑫《资治通鉴》第191卷，第290卷
- ⑥《隆平集》第17卷《杨业传》
- ⑦《欧阳文忠公集》第29卷
- ⑧《涑水纪闻》第17卷
- ⑪见郝树侯：《杨业传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
- ⑬《续资治通鉴》第5卷
- ⑬⑭⑮⑯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10卷
- ⑰《宋史·田钦祚传》
- ⑱《十国春秋》第105卷
- ⑲⑳见《山西大学学报》1978年第2期：杨芷华《杨家将的历史真实》；《山西师院学报》1979年第3期：降大任《关于杨业的一个疑点》
- ㉑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20卷，第21卷
- ㉒《宋史纪事本末》第13卷
- ㉓⑳《烬余录》甲编
- ㉔《辽史》第83卷《耶律休哥传》
- ㉕《辽史》圣宗本纪
- ㉖《契丹国志》第7卷圣宗本纪
- ㉗《东都事略》第27卷《潘美传》
- ㉘《关中金石记》第6卷
- ㉙《宋史·折德赓传》
- ㉚《资治通鉴》第284卷
- ㉛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38卷
- ㉜④⑤清乾隆《保德州志》第8卷
- ㉝见1978年12月5日《光明日报》